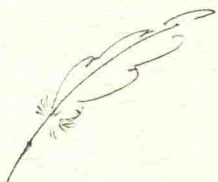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重订本

[美]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 著 [美]潘戈 Thomas L. Pangle ● 编

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

—— 施特劳斯思想入门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郭振华 等 ● 译

叶然 ● 校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重订本

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

—— 施特劳斯思想入门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美]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 著

[美]潘戈 Thomas L. Pangle | 编

郭振华 等 | 译

叶然 | 校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施特劳斯思想入门/(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著;郭振华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7. 8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ISBN 978-7-5080-9198-3

I. ①古… II. ①列… ②郭… III. ①施特劳斯(Strauss, Leo 1899-1973)—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712.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8773号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 1989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7-4134号

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

作者 [美]列奥·施特劳斯

译者 郭振华等

责任编辑 陈希米

责任印制 刘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8月北京第1版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06千字

定 价 89.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施特劳斯集”出版说明

1899年9月20日，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 Hessen 地区 Kirchhain 镇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人文中学毕业后，施特劳斯先后在马堡大学等四所大学注册学习哲学、数学、自然科学，1921年在汉堡大学以雅可比的认识论为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一直关切犹太政治复国运动的青年施特劳斯发表论文“柯亨对斯宾诺莎的圣经学的分析”，开始了自己独辟蹊径的政治哲学探索。三十年代初，施特劳斯离开德国，先去巴黎、后赴英伦研究霍布斯，1938年移居美国，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师，十一年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直到退休——任教期间，施特劳斯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

施特劳斯在美国学界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二十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尽管时有著述问世，挑战思想史和古典学主流学界的治学路向，身前却从未成为学界声名显赫的名人。去世之后，施特劳斯才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最重要的流亡哲人：他所倡导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学问方向，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学界的未来走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施特劳斯身后才逐渐扩大的学术影响竟然一再引发学界激烈的政治争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觉得，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理想心怀敌意，是政治不正确的保守主义师主；后现代主义者宣称，施特劳斯唯古典是从，没有提供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具体理论方略。为施特劳斯辩护的学人则认为，施特劳斯从来不与某种现实的政治理想或方案为敌，也从不提供解答现实政治难题的哲学论说；那些以自己的思想定

位和政治立场来衡量和评价施特劳斯的哲学名流，不外乎是以自己的灵魂高度俯视施特劳斯立足于古典智慧的灵魂深处。施特劳斯关心的问题更具常识品质，而且很陈旧：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施特劳斯不仅对百年来西方学界的这个老问题作出了超逾所有前人的深刻回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这迫使所有智识人面对自身的生存德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中，难免成为“主义”信徒的智识人如何为人。

如果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危机的影响也已经深陷危机处境，那么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给中国学人的启发首先在于：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新左派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好，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应对中国文明所面临的深刻历史危机——“施特劳斯集”致力于涵括施特劳斯的所有已刊著述（包括后人整理出版的施特劳生前未刊文稿和讲稿；已由国内其他出版社出版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起源》、《思索马基雅维利》、《城邦与人》、《古今自由主义》）除外），并选译有学术水准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相信，按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培育自己，我们肯定不会轻易成为任何“主义”的教诲师，倒是难免走上艰难地思考中国文明传统的思想历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8 年



列奥·施特劳斯

中译本说明

本书汇编了施特劳斯的若干单篇文章、讲学稿和未刊文稿，旨在为了解施特劳斯的学问品质和学术关怀提供恰当的基本文献，实可作为施特劳斯学问的入门读物。

十八年前笔者着手组译本书，陈建洪博士所译两篇，先行刊于笔者当时主编的《道风》学刊（香港，2000年第一辑）。因全书版权迟迟未获解决，徐卫翔、丁耘博士所译诸篇亦仅能在学刊中先行刊出。2008年初，全书版权终获解决，承蒙郭振华等同志译出余下各篇，覆校各篇旧译，补全原书页码（中译本编码，用方括号标出），并从潘戈教授索得序文一篇，为中译本添色；又承叶然同志再度覆校全书，加了若干必要的编注，谨致谢忱。

原书所附潘戈教授编的“施特劳斯著述编年”成于十多年前，多有缺漏，我们用叶然同志晚近编成的“施特劳斯文献分类编年”取而代之。

刘小枫

2017年2月

中译本前言

潘戈 (Thomas L. Pangle) 撰

郭振华 译

为中国读者介绍这本书，既是一份荣幸，又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施特劳斯对于西方诸传统学养精深，但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传统——他感叹这是一个令人遗憾却又无法克服的个人局限。施特劳斯深信，要真正领会一本伟大的作品，就必须读原文。他通晓希腊文、拉丁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以及多门现代欧洲语文——然而未掌握中国和印度的伟大语文。在“什么是自由教育？”(What is Liberal Education?)^①一文中，他以恰如其分的谦虚语气说道：

我们不能成为哲人，但我们可以爱哲学；我们可以试图进行哲学探究。这种哲学探究在任何层面上都首先在于（并在某个层面上主要在于）倾听伟大哲人之间的交谈，或者更普遍、更小心地说，在于倾听最伟大心智之间的交谈，因而也在于研习那些伟大著作。我们应当倾听的最伟大心智决非专指西方的最伟大心智。妨碍我们倾听印度和中国最伟大心智的仅仅是一种不幸的被迫：我们不懂他们的语文，而且我们不可能学习所有语文。

^① 见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页7。[译注] 中译文参一行译，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美德可教吗？》2005，《经典与解释》第5辑，北京：华夏出版社。下面的引文有所修订。

在本书题为“海德格尔式存在主义导言”(Introduction to Heideggerian Existentialism)的文章中,施特劳斯总结了海德格尔朝东方思想的转向。施特劳斯说,海德格尔将东方思想视为一个可以“超越”那些“希腊哲学本质局限”的途径,而“希腊哲学即技术的根源”——正是技术令“人的人性有毁灭之虞”。在这一方面,施特劳斯显然并未跟随海德格尔。施特劳斯坚称,必须作出海德格尔未作出的一个根本区分,即区分现代理性主义与古典(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理性主义,尤其在政治哲学方面,而这方面为海德格尔所完全、彻底地忽视:“海德格尔著作中没有政治哲学的地盘……他丝毫未给政治哲学留下位置。”^①正是在苏格拉底式政治哲学之中,也正是通过它,古典理性主义才得以证明自己敏锐地意识到了自身的真正“本质性局限”——海德格尔并未完全正确地指出这些局限。作为苏格拉底式政治哲学的一个直接结果,古典理性主义并不导致或指向现代技术,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智识资源,以帮助现代的人性抵御我们的技术加诸人类精神的种种毁灭性威胁。尽管谈了所有这些,我认为施特劳斯在某种前提下分享了海德格尔东方转向的一部分,正如下面这些话所表达的:

海德格尔是惟一对世界社会这个问题的诸维度略有所知的人。我们亟须东西方的交会。西方必须对克服技术性作出它自己的贡献。西方必须首先在自身之内寻回使这种交会得以可能的东西:它本己的至深根源,这根源先于其理性主义,也在某种层面上先于东西方之分。东西方之间的真正交会不可能在当今思想的水准上发生——也就是说不可能在东西方

① 施特劳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页30,34。[译注]中译本见《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张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最浅薄时期的最吵嚷 (vocal)、最轻率 (glib)、最浅薄的代表者之间发生。东西方之间的交会只能是二者最深层根源的交会。西方思想家可以沉潜到西方的至深根源来准备那个交会。在西方内部理性主义的限度总是为圣经传统所发现。……但对这一点必须正确地理解。圣经思想是东方思想的一个形式。把圣经绝对化，就堵塞了通向其他形式的东方思想的道路。然而圣经是我们西方人之内的东方。^①

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在我们的时代，东方和西方之间亟须在最深的层次上进行对话，施特劳斯的毕生事业就是自觉为此进行准备的典范。但是施特劳斯已然逝去。他把这种典范以及对于该典范的庄严职责遗留给我们生者。面对这种典范和职责，处于西方的我们并未很好地恪职尽责。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们需要一种高贵的竞争：你们向我们展示了，施特劳斯的引领和典范可以如何照亮东方至深的根基，可以说你们此举就是在与西方乃至西方的至深根基进行竞争与对话。也许这将刺激并砥砺我们把各自分内的事情做得更好，以担当施特劳斯所含蓄地向我们所有人指出的全球性历史使命。

① [中译编者注] 见页 [43]。本书中译编者注和译注中的方括号页码均为英文版页码，即中译文的随文方括号编码。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1
中译本前言（潘戈 撰）	1
编者导言（潘戈 撰）	1

第一编 现代理性主义的精神危机

1. 社会科学与人文素养	41
2. “相对主义”	53
3. 海德格尔式存在主义导言	70

第二编 古典政治理性主义

4. 论古典政治哲学	95
5. 显白的教诲	113
6. 修昔底德：政治史学的意义	126
7. 苏格拉底问题五讲	161

第三编 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对话

8. 论《游叙弗伦》	253
9. 如何着手研究中古哲学	275
10. 进步还是回归？	295

施特劳斯文献分类编年（叶然编）	345
索引	376

编者导言

潘戈 撰

曹聪 译

[vii] 施特劳斯是谁？进一步说，他代表什么？他传播了什么样的政治哲学？或者说，我们是否必须追问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他所说的政治哲学是什么意思？在 1945—1970 年间，施特劳斯掌握了一门叫做“政治观念史”的沉闷而垂死的学术科目，并将其转化为一项具有摄人心魄的重要性和生命力的志业。究竟是什么让政治思想史在他手中焕发出如此强大的吸引力？施特劳斯的著述不断打破种种可敬的智识范畴和规则，并挑起如此多的迷恋与如此多的敌意，这是怎么回事？

自 1973 年施特劳斯逝世以来，其影响力稳步上升，并在过去的几年间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但是，施特劳斯的声名日隆已成为如下两件事的契机：一些声称对他有所了解的人们开始激烈争论，而那些仅仅通过这些激烈争论才对施特劳斯有所耳闻的人们也同样陷入极度迷惑。发现施特劳斯自己的学生们及追随者们对其作品含义的理解意见不一甚至大相径庭，大约不必感到惊诧：毕竟，有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没有在其追随者之中留下一份或多或少还算丰富的论争作为遗产呢？然而，无法不令人惊异的是，施特劳斯乃至其学生或追随者，成为攻击对象的频率如此之高，这些激昂甚至尖刻的攻击尤其来自同行学者们和知识分子们。

那些不带偏见的研究者们开始研究施特劳斯的著作，以期发现上述事态的原由；他们也许无法找到答案，尽管如若坚持下去，他们或许会开始领略施特劳斯著作乍看上去的晦涩性——或毋宁

说是格格不入的（alien）品性——与最终爆炸般批判效力之间的悖谬关联。

往昔作为自由之源

[viii] 施特劳斯极富特色地表述他的思想，其表述方式就是细致而悉心地、新颖或非正统地解释往昔哲人们和神学家们的主要文本——这些文本不仅来自古典世界和早期现代世界，还来自中古世界；不仅来自拉丁-基督教传统，还来自犹太及伊斯兰（希伯来和阿拉伯）传统。施特劳斯的解释以寻求与被研习的思想家们进行对话为旨归；但是，试图把握、领会这些对话的读者首先必须承担这样一项任务：以新视角悉心研习施特劳斯所致力之文本。坚持仔细分析过去的哲学作品，绝非仅仅意味着施特劳斯个人的或独特的进路。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样的研习是在我们时代进行真正哲学思考的一个本质性前提。施特劳斯主张，我们若要使我们的头脑摆脱我们时代和文化的蒙蔽和偏见，就必须不断地迫使自己迎接某种挑战，这挑战来自并不分享我们现代诸预设的深刻思想方式。我们的时代当然不再是起初那个时代，彼时自我批判地研习古老哲学文本一直是通向精神自由的首要途径。但是在我们的时代，这一途径具有了一种空前的重要性（以及困难），因为当下的时代几乎空前地排斥先前诸时代发展出来的真理主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正因如此，我们的时代陷入了精神崩溃以及智识危机或衰败。施特劳斯声称，当代思想家（除了一些例外）已不知不觉地为某些含混却又貌似“不可置疑的”哲学设想所奴役，这些设想试图使我们进步地告别某些论题、主旨甚至写作方式或交流方式，而这些东西恰构成西方丰饶的智识内核，包括圣经和哲学双重维度。施特劳斯声称要论证，这些越来越被遗

忘的问题其实是人类生活惟一 (the)^① 最重要的问题，是惟一真正界定并阐明人类处境本身的问题，在一切时空皆然——甚至当这些问题与人类根本处境被忽视时亦然。简而言之，仔细阅读后就会发现，施特劳斯著述乍看上去的史学外表甚或学究外表，其实标志着施特劳斯锐利得令人伤神的批判立场，这立场几乎针对当代智识景观和政治景观中的每一个主要表征。[ix]

独行其是者对种种权威

既然批判如此坚决，既然风险如此之高，既然要求——要求心智开明地对待不熟悉的思想方式、要求有时苦恼地自我质疑——如此重大，大抵文化和学界循规蹈矩的 (conventional) 护卫者们自然会冲过来，并试图踩灭那威胁到他们既定和平与宁静的火苗。

已经存在某些值得注意与钦慕的例外者，但或许不足为奇的是，作为对话者与批判者，这些人本身的工作挑战了循规蹈矩的学术生活和智识生活，尤其在英美世界。伟大的法国左派黑格尔主义哲人科耶夫 (Alexandre Kojève) 极富挑战性地回应了施特劳斯所记述的色诺芬哲学，这诱使施特劳斯又作出回应——由此 20 世纪最富才智的论争之一得以诞生并付梓。^② 研究英国政治思想的头号马克思主义史家马克菲尔森 (C. B. Macpherson) 与施特劳斯特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源头霍布斯和洛克做过相互抗衡的非正统解

① [中译编者注] 对 the 的强调表示“独一无二的”、“真正的”、“本身”。后文灵活处理。

② 见施特劳斯，《论僭政》(On Tyrann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译注] 第四次修订版：施特劳斯，《论僭政》(On Tyranny, Victor Gourevitch、Michael S. Roth 编，Chicago: 2013)；该书中文译本参《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彭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释，他们还发表了针对对方的可敬而悉心的批评。^① 战后法国寂寥又理智的自由主义倡导者阿隆（Raymond Aron）将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② 引以为有原则地明智的精心之作，此种明智可以提供一个政治上清醒的中间立场，使之处于极端个人主义的萨特存在主义，与教条的或威权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然法道德主义之间。^③ 海德格尔最有天赋的学生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和洛维特（Karl Löwith）分别曾与施特劳斯广泛地论争历史哲学的意义和内涵。^④ 20 世纪最重要的古代史学家莫米里亚诺（Arnaldo Momigliano）曾写下一篇施特劳斯的品鉴，^⑤ 试图为施特劳斯在紧密团结的古典学界赢得发言权——但收效甚微。

时下学界对施特劳斯的反应显得吹毛求疵。很难表述对施特劳斯那些打破先例的著作的多种已出版评论的论调和层次，这么说看来并不夸张。那些针对施特劳斯的指控令人惊异地名目繁多且相互矛盾，人们在审视这些指控时，无奈地笑着质问：还有哪些道德过错或智识过错被证明是这家伙没有犯过的？一方面，施

① 尤参马克菲尔森，《民主理论》（*Democratic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章 14；施特劳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前揭，章 13。

② [译注]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中译参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③ 阿隆，《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者》（*Marxism and Existentialist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页 84 以下。

④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75；[译注] 中译参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页 482 - 491；施特劳斯和伽达默尔的通信以及施特劳斯和洛维特的通信刊于 *The Independent Journal of Philosophy*, 2: 5 - 12 (1978)；4: 105 - 119 (1983)。亦参施特劳斯关于洛维特的讨论，见《什么是政治哲学？》（*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9），页 286 - 270。

⑤ “施特劳斯的释义学和古典思想”（*Ermeneutica e pensiero classico in Leo Strauss*），重印于《第四届古典学和古代世界研究文集》（*Quart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et del mondo antico*, Rome: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69），页 117 - 128。

特劳斯及其追随者经常被指控为无所事事、爱好幻想的古物贩子，他们以某种方式引诱那些才智卓越却不幸容易上当的学生们彻底不再积极关注那些影响当代生活的严肃 [x] 议题。于是，一部曾在 1960 年代名噪一时的分析派政治理论作品如此不屑地评价施特劳斯：“整个职业生涯都把古典著作涤荡于唇舌之间，仿佛品尝陈年白兰地似的（施特劳斯及其弟子就是这样主张），而这么做几乎不可能增加人类知识的总量。”^① 无独有偶，一位伯恩耶特（Burnyeat）先生向《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976 年 4 月 9 日）的读者们保证，施特劳斯尽管以政治理论家自居，却“压根儿未曾显示出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种种现实抱有丝毫兴趣，无论对于古代还是对于现代”。

可是与此同时，有时甚至就是同一个批评家^②又指控施特劳斯拥有十分令人着迷的政治影响力。正如忧心忡忡的伯恩耶特先生指出（1985 年 10 月 10 日）：“当施特劳斯退休时，他也许算得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施特劳斯思想的广泛吸引力归因于施特劳斯的弟子布鲁姆（Allan Bloom），其《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③无疑是居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畅销书榜首数月的智识要求最高的著作之一。

如今愈加不可否认：施特劳斯的思想针对着公众的某些最深层关怀，尤其针对着（但绝非专门针对着）那些至今尚未信奉什么的青年人。惟一有争议的问题是：他要达成（up to）什么？施特劳斯与他所影响的人们一直激发学生富有激情地严肃地阅读古

① Brian Barry, 《政治论争》（*Political Argumen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5），页 290。

② 比如参 Burnyeat 先生后来再次攻击施特劳斯的文章，见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85 年 5 月 30 日、10 月 10 日、10 月 24 日；1986 年 4 月 24 日；1988 年 3 月 31 日。

③ [译注]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中译文参缪青等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老经典，促使他们询问所有非同寻常的问题——关于书籍，关于灵魂，关于上帝，关于道德，关于民主。这些问题当然并不符合循规蹈矩的范畴；它们显然预设了对既定智识权威的质疑，对其可敬解释的质疑，对其广为接受的思想方式的质疑。这些“施特劳斯派”正教诲着某些可笑的东西：我们无法指出他们要达成什么；施特劳斯的著作如此难懂；要领会一种复杂而新颖的思想方式，无论如何都很难。不过我们确实明白这种思想方式格格不入，明白它难以理解，明白它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挑战着头脑健全者的意见，明白它因此而“具有精英主义性质”或——对！——“具有非美国性”。于是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数页篇幅中，“施特劳斯及其追随者们”因“与最狂躁的左派全权主义者存在某种‘反向一致’”而受到指控，而且有人已经因施特劳斯致力于“拒斥美国经验所暗含的价值”而将他与马克思相提并论。^①近来，这种指控被导入了流行的保守派媒体，如《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xi]于1985年3月22日发表了一位教授所撰的封面报导，该报导质疑大学中的“施特劳斯派”是否并不“具有非美国性”；而且，据说右派对非美国式活动的这些指责罕见地获得了左派的好评，因此一位作者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85年10月10日）上称赞《国家评论》的指控是“冷静的论断”。但另一方面，还是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施特劳斯的思想又被解释为一种夸张的美国式爱国主义的体现，这种爱国主义着迷于营造对“‘共产主义’和某种‘东方专制主义’威胁”的美国式抵制。^②1975年，《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期刊更过分，它刊载的

① Stephen Holmes 文，参见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73：113 - 128（1979），引文见页 113；Stanley Rothman 文，见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6：341 - 352（1962），引文见页 352。

② J. G. Gunnell 文，见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72：122 - 134（1978），引文见页 123。